



浙東文化

河姆渡遺址

1994 1·2

(三) 梁介侯杯鼓墓

浙东文化 1994年第1、2期合刊(半年刊) 1994年10月出版

《浙东文化》编辑部编 印刷：浙江鄞县文教印刷一厂

主 编 董贻安 订阅：宁波市文化局文物处

(宁波市永丰路32号, 邮编: 315010)

内部报刊准印证 (浙) 字第02-1062号

编者话

90年代初，当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成立的时候，不少文物工作者都曾热切地期盼着创办一本能及时发表自己学术成果的专业刊物，几经周折，反复酝酿，今天，《浙东文化》（内刊）终于面世了，怀着几分喜悦，又揣着几分不安。

浙东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包含着十分宽泛的内涵和辉煌、璀璨的历程。因此，充分认识浙东文化的整体价值取向，深入探究浙东文化各个领域，尤其是文物、考古、博物馆学及其他诸学科的发展脉络、学术动向、在继承、弘扬名城宁波历史文化精粹的基础上，阐述观点，展示成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培育学术新苗开辟一个园地，为公众了解宁波文博研究水准增设一个窗口，为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架设一个桥梁，为营造宁波跨世纪文化巨构添一块砖，铺一块瓦，这就是《浙东文化》的宗旨和夙愿。

诚然，《浙东文化》是宁波文化百花园中一颗稚嫩的小草，但她自筹办开始就得到众多园丁的精心扶植与浇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我国文博界德高望重的启功教授亲自为本刊题写刊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著名学者史树青先生特赐稿本刊，浙江省、宁波市新闻出版局对本刊出版也是关心倍至，谨此，深致由衷的谢意。

愿《浙东文化》成为广大文物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诤友。

第1、2期合刊

1994年10月出版

目 录

编者话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遗址为姚墟说	史树青 (特约) (1)
	河姆渡文化与舜耕历山	邵九华 (4)
	试论河姆渡遗址稻谷发现的文化学意义	虞浩旭 (13)
	河姆渡先民的原始历法	叶树望 (23)
	我国古民族族源探索——兼论与东夷族虞舜的关系	茅冥家 (31)
	骨匕浅析	赵晓波 (41)

文管物理	关于当前文物流通领域若干问题理性思考 备忘录	董贻安 (45)
------	---------------------------	----------

越青瓷	“秘色瓷”诸相关问题探讨	谢纯龙 (52)
-----	--------------	----------

考古研究	浙江宁波考古述略	林士民 (63)
	宁波出土铜镜探讨	林 瑛 李 军 (82)
	宁绍平原汉至六朝墓砖初探	贺宇红 (92)
	辽陈国公主驸马墓盘探讨	厉祖浩 (101)

考古新现	北仑出土一	陈美丽 (103)
------	-------	-----------

浙东佛教文化	试论浙东佛教文化的区域特征	董贻安 (105)
	浙东鄞县东钱湖南宋佛教文化考	曹厚德 杨古城 (118)

《海史防述》	象山明代海防遗址初探	符永才 (127)
《古籍与文献》	蜗庐赠书目录前记	骆兆平 (135)
	千晋斋藏砖文化的解释	徐 的 (139)
	从《促织经》说到《秋虫谱》	李大东 (144)
《对外交流》	宋明州高丽使馆考	方祖猷 朱爱武 (148)
《四明人物》	南宋名臣魏杞事略	张亚君 (155)
《博物馆与博物馆学》	伦敦博物馆考察纪要	周庆南 (162)
	博物馆教育的特殊性初探	王宏星 (168)
	从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开放简论德育教育基地的建设	袁尧明 (173)
	简论文物藏品所蕴涵的信息特点	施祖青 (177)
《名城保护》	城市规划中文物保护方法探索	吴 彦 (180)
《古代建筑》	慈城明代民居概要	章国庆 (183)
《学术动态》	中国·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余姚召开	(186)
《出版信息》	大型图录《宁波文物精华》、《宁波文物考古博物馆论文集》即将出版	(188)
补白9则	得之而后知 (22) 用人 (30) 慎其所处 (40)	
	磨日光 (44) 上古的炊具 (81) 我国现存	
	的佛舍利有多少 (100) 恃才傲物者戒 (138)	
	聪与敏 (167) 集《兰亭序》字楹联 (187)	
	天一阁珍藏历代书画精品选录 (封二) 鄞县东钱湖南宋墓	
	道石刻选录 (封三)	
	责任编辑、校对: 励凤霖	

河姆渡遗址为姚墟说

· 史树青 ·

浙江历史悠久，远在7000年前，培育了古老的河姆渡文化，继而发展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至吴越文化。我们还可以说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是中国江南新石器时代最悠久、最丰富的文化遗址。她位于姚江之边，历史上认为姚江之得名是以五帝之一的虞舜之姓而命名的，故姚江又称舜水，北流至上虞县。自秦汉以来，余姚便以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称誉浙东。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虞舜的事迹，《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许多记载，虽然其中有不少是古代的传说，但反映了许多历史的影子。《史记·五帝本纪》张宁节《正义》引《括地志》云：“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余姚，县西七十里有汉上虞县。《会稽旧籍》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处《风土记》云：舜东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孝经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又《正义》引《括地志》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可见在唐代撰写《括地志》的时期，舜诞生地仍存在许多分歧意见。

清代著名学者梁玉绳关于帝舜有虞氏的研究，在《汉书人表考》中，提出了许多早期的史料：“帝舜，始见《书·舜典》，有虞氏屡见《礼记》、《国语》，五帝之五也。舜又作俊，亦曰帝舜氏，亦曰虞帝，亦曰虞舜，亦曰大舜，亦曰重华，亦曰都君，亦曰仲华，亦曰黄帝，姚姓，父瞽瞍，母握登，感大虹而生舜于姚墟。”

由以上所见记载，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姚”是否因虞舜之姓而得名，余姚是否因舜之余族而得名，都值得进一步探讨。从文字起源看，“姚”应是源于卜兆，犹“姜”之源于牧羊，“姁”之源于服象，“姁”之源于农耕。《尚书·尧典》以舜为虞帝之名，注谓虞氏舜名，从虞字看，应是与畜牧有关的氏族。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山泽篇》关于“墟”字的解释说：“据《尚书》称‘舜生姚墟’，又说：‘姚墟在济阳城阳县’，但是，今本《尚书》无‘舜生姚墟’的记载，此为《尚书大传》文。《孟子·离娄》则云‘舜生于诸冯，迁于复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传说各异。

按：“墟”本作“虚”，《说文》释为“大丘也”。《吕氏春秋·贵直》：“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虚即旧城、废址之意。舜生之姚墟，则是姚之大丘或姚之废址，可以认为即前引《会稽旧籍》所称“去虞三十里”之姚丘。舜生之姚墟则是舜以前其地即以姚命名了。至于余姚之名，则是姚前冠以余字，此余字应是古越语之发语词，为所发之声，今所见冠以余字的古地名如余杭、余干，古人名如余善、余祭、余昧，冠以句字的古人名如句践、句亶等，皆百越族之一支也。详见周振鹤、游汝杰《古越语地名初探》。（复旦学报，1983年3期）。

古代文献和传说中关于舜与东夷及南方之关系甚多，他是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或部落之间战争的一种反映，即舜父瞽瞍、舜、象一家人的争执，事实是一个部落内的氏族为了争夺财产进

行的互相杀害。

从河姆渡遗址的年代及出土文物中的厚重黑陶，生产工具中大量的骨镞和骨耜以及稻穀和稻秸的遗迹等，可以看出当时私有制已经萌芽，与姚墟的地望及历史变化，有许多相近之点，因此，提出河姆渡遗址为古代所传之姚墟。请专家、学者指正。

《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 论文集》即将出版

我市文博系统建国以来第一部学术论文结集——《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论文集》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该论文集系从我市文博系统首届优秀学术成果参评论文中精选而编辑，共计50余篇，涉及文物、考古、博物馆、古籍、文献、美学、佛教文化、越窑青瓷、名城保护，工艺美术等诸学科，不少论文曾发表于国内外各类专业刊物，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该论文集由董贻安主编，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著名学者史树青先生题签书名。

河姆渡文化和舜耕历山

邵九华

余姚有舜耕历山，禹藏秘图^①的传说，而舜耕历山的传说在国内分布很广，《辞海》“历山”条择要罗列了山东、山西、浙江、湖南四省境内的九处，因此舜是否在余姚耕耘过很难定论。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余姚市境内陆续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特别是七十年代初，举世闻名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揭开了余姚的上古历史，这为研究舜耕历山（指余姚的历山，上简称舜耕）提供了翔实的物质资料。笔者希冀通过对舜耕传说的认识，阐述河姆渡文化对余姚及浙东地区原始文化的影响。

一、骨耜、稻作、舜耕

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传说故事离不开人类生活的源泉，它的流传同样需要一定的生活基础和社会基础。舜耕传说反映的是舜教百姓耕作的故事，内容比较简洁：“很久很久以前，历山还是海中小岛，后来海水退去，才成了小山。河鱼佬没有鱼河无法生活，这时来了舜。带领大家耕耘，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②传说字数不多，但时空跨度很大，它反映的是原始人从渔猎发展进入农耕经济时期的社会历史。河姆渡遗址是我国东南亚沿海地区表现这个历史阶段社会生活的典型遗址，考古获得的实物资料充分说明舜耕的传说是有深厚的生活基础。

河姆渡遗址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口北侧，遗址总面积4万平方米，已发掘2800平方米，出土文物7000多件。遗址由上下

迭压又前后承接的4个文化层构成，经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4个文化层距今年代分别是7000年，6000年、5600年和5000年。^③ 遗址出土文物包括了河姆渡先民拥有的大部份生产、生活资料，其价值首推人工栽培水稻和木建筑构件。在第一次考古发掘的630平方米内，稻谷堆积物的面积达400余平方，厚度在20—50厘米，据估测，稻谷的数量多达120吨。^④ 最近农学家从出土的人工栽培稻谷中分辨出少量混杂的野生稻谷粒。^⑤ 这样更进一步证实河姆渡是我国栽培稻的发源地之一。伴随稻谷，出土数量众多、门类齐全的农具，有骨耜、木耜、石耜、骨镰、木杵四五种，数百件。骨耜是主要的耕作农具，在第一次考古发掘区第四文化层出土就有89把，^⑥ 它用水牛、鹿、四不象等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敲凿磨制而成。形似斧，顶端柄部较厚、窄，末端刃部宽、薄，由于所取的动物不同，骨耜的大小也参差不齐，顶端宽约4—5厘米，末端10~15厘米，高约13~25厘米。多数骨耜的上端凿有横穿的方孔，中间骨面也凿着两个平行的长圆孔，上下孔都用来固定木棒，二者组合起来类似铲，适宜南方水田劳动。出土的骨耜因长期使用显得十分光滑，柄及背部绳索绑扎过紧痕迹清晰可见，刃部磨蚀较多，呈平铲状、半圆舌状，叉状或波浪形，大型骨耜的发现表明生活在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时期的先民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阶段，而进入到耜耕(耜耕)阶段，^⑦ 笔者作过一次骨耜仿古复制实验，选用的材料是一根长28厘米的现代家养水牛肩胛骨，用石块截切和磨砺的方法制作成长21厘米，顶部宽6厘米，底下刃部宽13厘米的骨耜。修正骨耜外形整整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比较难的是打凿骨面和柄部的圆孔，最后用钻头钻成的。通过仿制，可以知道河姆渡先民制作骨耜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劳动，而且进一步认识，正是为了翻土的需要先民才把肩胛骨底部长度在7—8厘米的薄面部分先行截去，故此现在听见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一般都在20厘米左右，骨耜作为翻土工具是毋庸置疑的，以骨耜为标志的稻

作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特征。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植物资料证明，在以捕猎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时候，原始人的生存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出土的虎、豹、野猪等猛兽的遗骸比较少。水牛、鹿、四不象、猴子等温驯动物遗骸众多，说明捕获较多。它们之中又以老弱幼小对象居多，实际上原始人要捕猎到一只大型动物是非常艰难的。经历了漫长的积累，人类终于发明农业栽培技术，这在人类历史上又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它不仅仅改变了原始人的生产方式，更主要的是为人类的生存、繁衍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使人类有充裕的时间改造环境，拓宽生活，促进社会的进步。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还发现大批纵横交错的本构件，密密层层布满了整个发掘区，考古学家鉴定它们是底层架空，上面居住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在建筑技术上，河姆渡先民已学会使用榫卯结构，其榫卯形式都基本符合受力情况的要求，尤其是销钉的使用和企口板的发明，标志着此时的本结构已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⑧这里还出土了大量驯养的狗、猪、水牛等家畜的遗骸，数百件纺轮和编织用的纬刀、木梭，直径不到2毫米的有孔骨针，几万件陶片和一大批稚拙的原始艺术品。由此可以肯定，在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已经结束了游弋状态，进入比较稳定的耜耕农业阶段。这以后农耕技术逐渐扩散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⑨在距今4000多年前，稻作农业已成为我国广大南方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近几年从姚北平原到象山港的浙东沿海地区发现大批相当于河姆渡一、二、三文化层的遗址，内涵比较丰富的有余姚鲳山、慈溪董家岙、宁波八字桥、鄞县辰交、奉化名山后、象山塔山等。^⑩在余姚，与河姆渡遗址一、二文化层相似和稍后的原始文化晚期的遗址有二十几处，其中以历山以南，姚江以北的山丘高阜上最密集，计有茅湖、兵马司、西柳家岙、吴家岙、西竹山、翁家岙、鲳山、新周家、王杨车、黄家山、黄沙湖农场、市水稻原种农场

和童家岙（慈溪市）13处。它们之中文化内涵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的只有童家岙、鲳山二处，多数相当于河姆渡第一文化层，从地理位置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先民的活动范围呈现向杭州湾滨海地区发展的趋势。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茅湖遗址，它位于历山镇茅湖边上，出土文物除陶器、石器、人骨、兽骨外还有稻谷。据村民反映，先前他们经常能挖掘到木板和木桩，省文管会认为这是古越州地区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⑩汪济英先生把茅湖遗址的出土文物归属于良渚文化的范畴之中。^⑪那么它在时间上略晚于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而接近舜耕的时代。余姚目前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址尽管在文化内涵上有差异，即时代的发展带来的变化，但是遗址的位置都选择在背山面湖的山前台地上，其田实际上是湖水后退形成的淤田，所谓舜耕也就是原始人用骨耜、木耜、石耜在淤田上耕作播种，栽培稻谷。舜耕的传说是蓬勃兴起的原始农业的反映。农学家认为“农业允许更加密集的食物种植，供应更加密集的人口，因而允许更大的社会集团的存在。”^⑫根据这个论断，结合出土文物资料，可以推断古籍《竹书记年》、《风土记》和《会稽旧记》中提及的“姚丘”、“姚墟”应是姚北山丘和散落其间的原始村落的总称。“姚丘”、“姚墟”名称的来历，上述著述者以为“舜姓姚”的缘故。虽然考古发现还未能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与否，但可以相信，在姚北山丘众多的先民中是会有他们拥戴的领袖。所以说，河姆渡文化推动了原始农业的发展，促进浙东平原虞越民族的形成，也造就了舜耕千古传说。

二、水灾、水利、治水英雄

传说故事的产生和流传除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外，还必须要有强烈的生活事件、尖锐的矛盾冲突，才能构成传说的核心，吸引千千万万，世世代代的民众。纵观中国远古时代的传说故事，自然

灾害和战争是它的两大主题。那么舜耕传说属于哪一个主题呢？强烈的生活事件又是什么呢？根据余姚市二十多个原始社会遗址的考古资料分析，出土文物中的利器主要是作为劳动生产工具的石斧、石凿、骨耜，骨针、木梭及箭镞之类，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器有千余件，但是有棱有角，可以用于搏击的木棍却没有发现。虽然曾出土数件鸟形象牙匕首，但是从遗址性质总体考虑，考古学家倾向把它作为氏族首领权力的象征，这样战争的因素可以排除掉。从自然灾害方面分析，隐约有线索可查：河姆渡遗址发掘中曾发现遗址第一文化层的表面有一段被洪水冲刷的痕迹，另外还发现一段鹅卵石溪滩，今天遗址周围河流纵横交错，但已找不到溪滩。经浙江省水文大队对这一带的古地貌勘察，认为距今5000年前遗址的东、西、北三面是湖泊和沼泽，南面与四明山相连接，有一条溪流源于遗址东南10公里的四明山芝村，经过遗址向北注入湖泊。^④现在夹在遗址与四明山麓之间的姚江，当初是在遗址西面24公里，今天余姚市区龙泉山西面向北注入杭州湾。姚江全长109公里，在余姚市区中游段河面宽还只40—50米，到了河姆渡遗址边上宽已100多米，深10多米，不是特大的灾害，原始人是无法开掘的。考古学家通过对长江流域东南地区原始社会遗址的多年考察，认为距今4500年前后，曾发生过一次全球性的气候变异，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根据。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中还有今天生活在热带丛林中的大象、犀牛、红面猴等动物及海金沙等植物孢粉。^⑤说明那时候河姆渡的气温和今天的广东、云南相仿，比现在要高4—5摄氏度，其次文化层之上的表土层厚只有70—90厘米，证实今天河姆渡的自然风貌形成的年代还比较短。对于这场气候变异的具体内容，学术界认为是全球性的水灾，这时候“气温下降，淫雨不绝，海水上涨，洪水经久不退”……^⑥陈桥驿教授认为在这场气候变异中发生的海侵最后形成了今天浙东平原的地形地貌。“……卷转虫海侵从全新世初期开始掀起，在

距今6000年时达到了高峰。这时宁绍平原西起会稽山北麓，东到四明山北麓成为一片浅海。”^⑦如果说海水确实到达四明山北麓，那么联系今天钱塘江海潮造成的杭州湾两岸大规模塌塘的灾害，海侵创造姚江改道的奇迹也是很有可能的。当然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对姚江生成变化的来龙去脉的认识会更深入。但是姚江的改道与河姆渡遗址的废弃是休戚相关的。河姆渡背有山林之饶，面有鱼泽之利，7000年前这里的动物多达61种，远比现在丰富。已经积累相当的生产经验，处于中华民族文明前夜的河姆渡先民最终却不得不离开这块养育他们长达2000年之久的风水宝地，环境资源枯竭说，农业轮作说的理由似乎还不够充分。事实是姚江改道向东奔流入海以后，一日两度的咸潮倒灌进来，土地迅速盐渍化，先民赖以生存的水稻种植从连年减产到没有收成为止，至此他们被迫放弃这块土地，向四方流散。他们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种植渔捞经验，因此不是退回山区，而是向姚北平原迁移。余姚市文管会收藏的部分茅湖遗址的出土文物有3个特点：1. 文物种类与形制和河姆渡第一文化层相同。2. 具有骨质生产工具减少，石制生产工具比例增大的河姆渡文化发展特点。3. 出现石制三角形破土器和网坠二种新的生产工具，表明农耕捕捞技术的进步。所以历山周围丘陵高阜的原始人应是迁移而来的河姆渡人后裔。这场气候变异带来的特大洪水，给河姆渡先民的影响是非常的深刻，洪水退去后先民面对的是房屋毁塌，田园荒芜，浊水四溢的破败景况，经过漫长的奋斗和胼手胝足的艰巨劳动，终于重新建立家园。在这场人与自然的悲壮冲突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英雄和传说故事，舜耕只是其中一个罢了。“那时候姚江经常做大水，他又带领大家治理姚江，所以姚江又叫舜江”，^⑧这是舜耕的矛盾冲突。

水曾给原始先民提供丰厚的资源财富，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除了水生动植物外，还有船桨、水井、水罐，河姆渡文化的滋生

得益于充沛的江南丰水。这场特大洪水也给先民深刻的教训，从而开创水利大业。虽然今天已无法考查原始的水利设施，但是余姚现在所知的最早水利工程大沽塘确实在历山发端，还有例如石堰、梁堰等有关地名保留了古代的水利建设的资料，舜耕的传说也是这里流传较广、较深。

三、舜、舜迹、文化交流

上面的考古资料说明余姚舜耕的传说并非杜撰，也不是后世传入，而是土生土长，有深渊的社会基础和鲜明的地方特色。现在又要回到老问题，即舜是否在余姚耕耘过？这个问题涉及到舜的身世籍贯和到余姚的目的原因。舜是传说中我国远古时代部落联盟的领袖，是开创中华民族历史的杰出人物，位于三皇五帝之列。舜的籍贯历史上有司马迁的冀州人和孟子的东夷人之说。孟子、司马迁都是世纪前的人物，但是距舜的时代也有二千多年之远，他们的笔下舜的事迹亦采自民间传说，可见舜的传说在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广泛。余姚也有“舜生于冯诸”的传说。余姚市长丰乡冯村，传说是诸冯古墟，村民多姓赵，村口立有明嘉靖年间所刻的“明考古赵先生故里”石碑。村民中已无人知道这个传说了。在历山、会讲舜耕故事的老年人却坚持认为舜是外地来的。那么舜是为什么来余姚的呢？笔者新近查到一则舜的传说解答了这个问题。

“……尧的儿子丹朱出还争夺帝位，于是带人去刺杀舜。文武百官知道这个消息后，派人告诉舜，叫他赶快逃命。舜向东海方向逃，丹朱在后面追，一日到了虞山脚下，丹朱也追到山下，舜连忙避进岙底，等丹朱过后才出来。他怕丹朱回转来寻人，就翻过道婆岭到了历山”。舜承尧位是禅让还是武力夺取，战国时期百家有争议，从另一侧面看这个传说反映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南北文化的交流，如果能够从考古上证实这个立论的成立，那么假定舜是中原部落的代表的话，是可以来到余姚，向余姚的先民学习

稻作栽培技术，交流先进农耕经验。考古工作者在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和辽东半岛渤海庙岛群岛中的大竹山岛南的海底都发现了侈口、圆腹而下垂、饰有绳纹的陶釜。“这种陶釜，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其邻近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均未见，而与在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和宁绍地区的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期的陶釜相类同。反映了峡石文化、山东地区史前文化与崧泽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影响关系”。^⑧考古学家认为在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对外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途径实现的，在河姆渡遗址内发现的鱼骨中有海鱼裸顶鲷和滨海河口鱼类的鲳鱼，加上木器中发现的6支木桨，说明了河姆渡先民有海上捕鱼的可能。海上捕鱼的出现，为海上航行创造了条件。所以考古学家认为“崧泽文化和河姆渡遗址第四期的居民既是向北航行可以达到渤海湾，那末，他们向南走也有可能到达广东沿海一带。……这并不排斥还有陆路交往的可能性。”^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以后，这种文化交流当然是更多，更密切。浙江省博物馆汪济英先生认为历山茅湖遗址出土的黑陶器皿与良渚出土的毫无差别，有段石斧、石斧、石刀、石镞也是这一时期常见的石制工具。^⑩但是考古工作者对茅湖遗址的文化归类上还未能统一起来，1987年春在宁波市慈城镇发现的慈湖遗址以后，这种分歧更加扩大。慈湖遗址的地层堆积可分三个时期：下层与河姆渡的上层相当，中层属于良渚文化，上层的情况不甚明了，可能是相当于马桥四层的后良渚。这种地层上下迭压的文化层，内涵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考古界的很多同志还是认为它是河姆渡文化的延续。^⑪因此还是用交流发展的观点认识更正确。由于交流范围的扩大，交往的频繁，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更具时代特色。河姆渡文化从它开始之初就处于对外的交流之中，到了舜的时代则是愈加广泛与密切，舜到余姚来，不存在交通上面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传说中开创中华民族历史的三皇五帝之中，浙东地区最崇拜

的还是舜、禹二帝。据调查，在绍兴、余姚、上虞三县境内，方志和其它文献中记载的舜禹古迹有18处，其中舜出生处二、舜母出生处二、舜耕处一、舜渔处一，舜葬处一。^②这在全国是少见的，从民族学看，舜曾对浙东地区有过重大的影响，随着考古学的深入，舜的实物资料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注：

- ①秘园山，在余姚市府大院内，相传禹把水利图藏于此山。
- ②、⑧《舜的传说》、《余姚市民间文学集成》。
- ③、⑥《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一期。
- ④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 ⑤《浙江日报》1991年8月31日。
- ⑦吴汝祚《我国早期种植水稻的氏族部落》、《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
- ⑧杨鸿勋：《河姆渡遗址早期木构工艺考察》、《建筑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 ⑨李再华、李放《略论百越早期稻作文化》。
- ⑩浙江省文物局《文物考古资料》1986年第4期，《文物简讯》1990年第2期，《宁波日报》1991年1月1日。
- ⑪《历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余姚报》1956年9月22日。
- ⑫、⑭汪济英《良渚文化的回顾与探讨》
- ⑬马克·纳森·柯恩《人口压力与农业起源》、《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
- ⑮、⑯《河姆渡遗址动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⑰王开发《根据孢粉分析推断上海地区近六千年以来的气候变迁》、《大气科学》1978年第2期。
- ⑱《绍兴水利史概要》、《绍兴学刊》1990年夏季号。
- ⑲、⑳吴汝祚《良渚遗址发掘的意义》
- ㉑林士民《宁波地区原始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 ㉒《历史时期宁绍平原城市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三辑，1988年。